

台灣社會研究季刊
第六十一期 2006年3月
Taiwan: A Radical Quarterly in Social Studies
No. 61, March 2006.

資本原始積累與中國大陸的農民工

黃德北

The Primitive Accumulation of Capital and the Peasant
Migrant Workers in Mainland China

by
Te-Pei, Huang

關鍵字：中國政治經濟研究、資本主義發展、資本原始積累、境內移民、農民工
Keywords: political economy of China, capitalist development, primitive accumulation of capital, internal migration, peasant migrant worker

* 本文之完成得到世新大學研發處的補助，本文屬於世新大學整合型研究計畫「全球化下移民／工支流動與處境」之子計畫3「資本原始積累與中國大陸農民工流動」的部分研究成果。本文初稿曾發表於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舉辦之「跨界流離：全球化時代移民／工與社會文化變遷」學術研討會，2004年6月19-20日。作者要感謝初稿評論人吳介民教授與其他兩名匿名評論人的評論與修改建議。

收稿日期：2004年11月8日；通過日期：2005年10月11日。

Received: November 11, 2004; in revised form: October 11, 2005.

通訊地址：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

服務單位：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

email: tphuang@cc.shu.edu.tw



中文摘要

從1978年以來中國大陸所進行的改革開放，已經使得中國大陸日益朝一個資本主義社會方向發展。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確立以前，會出現「資本原始積累」的過程，資本原始積累概念具有兩重意義：一是財富的集中，提供工業化最初資本積累的來源，二是「自由」勞動力的形成，為僱傭勞動生產創造基本的條件。因此在資本原始積累階段，將會出現大量農民被迫離開土地，成為「自由」的勞動力。

中國大陸原先是一個社會主義社會，因此它目前正在進行的資本原始積累過程勢必有其獨特之處，與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經驗非常不一樣，例如英國在資本原始積累過程時採取的是圈地運動的模式強迫農民離開土地，中國大陸卻在此之前先進行了某種形式的分地運動，自然使得農民離開土地的模式會與英國不一樣。本文將從比較的角度探討中國資本原始積累的特色及農民離開土地的模式，分析中國大陸與其他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發展經驗的差異，進而研究這樣的流動方式對於中國大陸未來資本主義發展的影響。

Abstract

The reform policy pursued by the Mainland Chinese government since 1978 has transformed the country into an ever more capitalist society. Before any capitalist mode of production is firmly established, there has to be a stage of "primitive accumulation of capital." This term carries a dual meaning: on one side there is the concentration of wealth allowing the initial accumulation of capital for industrialization; on the other there is the formation of a "free" labor force which makes possible production based on wage labor. It is, therefore, often a highly visible character of the stage of the primitive accumulation of capital that large amount of peasants are forced to leave the land to become "free" laborers.

Mainland China has been a socialist society in the past. The process of primitive accumulation of capital that is currently taking place in China, therefore, has to be very different from that in the historical experience of the advanced capitalist countries. Primitive accumulation of capital in England, for example, is characterized by the enclosure movement, which forced peasant farmers to leave the land. China, however, has undergone a movement of land redistribution, which naturally entails a pattern of the separation of peasants from the land that is different from that in England. This article uses comparative studies to explore the patterns of the primitive accumulation of capital and the separation of peasants from the land in China. The Chinese experience will be compared and contrasted with the experience of capitalist development in other capitalist countries. Such analyses can contribute to understanding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 in China.

西方說，中國一夜之間崛起了
但我知道那張國民經濟的底單：
成千上萬中國民工
正長眠在摩天大樓的基礎下
正如憲法上最公正的開頭：
「這是一個以工人階級為基礎的社會主義國家」¹

一、前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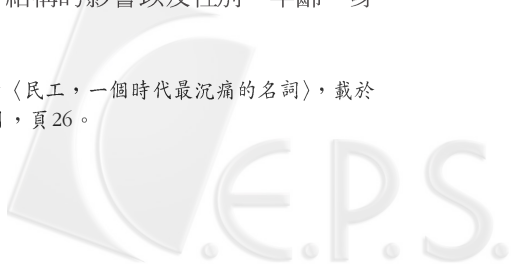
改革開放已經使得中國大陸日益朝一個資本主義社會方向發展，資本主義社會的主要特質就是，出現大批喪失生產資料的受僱者階級，今天這樣的階級結構正在中國大陸快速形成：大批農民被迫離開土地，進城成為「自由」的勞動力；同時城市中也出現大批下崗職工，正在尋求就業的第二春。這些「自由」勞動力的出現正為中國大陸勞動力市場的建立加速推動進行。

目前中國大陸有上億的農民被迫離開土地，離鄉背井出外尋求打工的機會，他們逐漸成為所謂的「自由」勞動力，這些農民工所受到的種種不合理待遇，常常成為海內外傳媒報導的焦點，讓人對他們的處境深表同情。類似的情景事實上在任何一個資本主義社會都曾經出現過，在許多開發中國家，今天也在進行著同樣的過程。

對於中國大陸農民工的研究目前可說謂汗牛充棟，這些研究中許多學者都偏重在微觀層面的研究，透過田野的訪談，分析農民工離鄉的主要原因，例如邊燕杰 (Bian, 1997)、曹子璋 (2001, 2003)、翟學偉 (2003) 與李漢林、王琦 (2001) 等人都是從農民工社會關係網絡的角度探討農民工的流動。

不過，這類研究往往忽略了社會結構的影響以及性別、年齡、身

1. 這是廣東惠州「打工妹」浪淘沙所寫的新詩〈民工，一個時代最沉痛的名詞〉，載於《批判與再造》(台北)，第7期，2003年5月，頁26。



分、階層等因素的差異（翟學偉，2003:1），因此我們認為，如果沒有宏觀理論的視野關懷與導引，農民工研究可能會出現見樹不見林的侷限。有些學者雖然將重點集中到社會結構的分析，但他們多偏重在城鄉體制中所存在的推拉因素如何影響農民工的流動（孫立平，1997；李強，2003），未能從資本主義發展的角度來看待中國大陸農民工。

大批農民工的出現是任何資本主義社會發展過程中所必然經歷的過程，馬克思在《資本論》（1867）中早就指出，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必將出現大量農民喪失生產資料變成雇傭勞動工人的轉變，中國大陸既已走向一個資本主義社會，則農民工也就成爲一個必然出現的現象。當前社會科學界對於中國大陸這些農民工現象已經有非常豐富的研究，但是鮮少有人從比較的角度，分析中國大陸資本主義發展的特質、中國大陸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建立初期所出現的問題及其與農民被迫離開土地的關係，我們認為這是一個很值得關注的議題，因爲它可以將中國研究與其他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發展的經驗進行比較的分析。

如果說中國大陸朝資本主義方向發展已經是一個不可逆轉的過程，那麼過去社會科學界對於資本主義相關研究的累積成果是否可以應用在分析中國大陸發展經驗上？這無疑將是一個非常具有挑戰性的主題，也是本文所想要達到的學術目標。長期以來，受到冷戰時代的政治影響，中國研究與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研究一直分屬兩個不同的領域，雙方面的研究者也一直缺乏交流，現在由於中國大陸的走向資本主義社會，如何將學術界過去對於資本主義社會研究所得出的成果與理論用來分析中國大陸資本主義發展，是一個學術上非常有意義的課題。尤其中國大陸原先是一個社會主義社會，因此與其他資本主義社會之前的社會結構有著很大的差異，它的發展模式會與其他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發展經驗有何異同？這就更是一個值得研究的議題。

關於資本主義發展與移民工流動關係這一議題的討論上，成露茜與Edna Bonacich是這方面的重要理論開創者（Cheng and Bonacich eds., 1984），他們從資本主義發展的角度來分析二次大戰前中國大陸

移民到美國的政治經濟結構性因素，借用馬克思主義的依賴理論與世界體系理論，他們指出資本主義發展導致不平等的分工與交換，核心國家對邊陲地區的剝削，使得邊陲地區一直處於低度發展的狀態，大量人口不得不外移尋求工作機會；同時，核心國家也存在對廉價勞動力的需求，於是大量移民工從邊陲地區湧入核心。以後他們進一步分析二次大戰後亞洲地區高科技人才往美國移民的過程，發現還是可以用資本主義發展這一理論架構來分析 (Ong, Bonacich and Cheng eds., 1994)。

我們認為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也可以用來分析當前中國大陸農民工的流動，中國大陸農民工流動的研究是可以放在資本主義發展與移民工關係的架構中來進行分析。另一方面，由於馬克思主義的依賴理論與世界體系理論可能更適用於分析跨國之間的移民流動，在探討中國大陸的農民工境內流動問題時，我們必須從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發展的其他研究中尋找到恰當的分析概念與理論。

本文企圖從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 (1867) 所提到的「資本原始積累」的角度來分析中國大陸農民工的流動，西歐的「資本原始積累」是從封建社會(前資本主義社會)過渡到資本主義社會，中國大陸的「資本原始積累」過程則是從社會主義社會逐漸解體再進入資本主義社會，因此它的發展過程會與西歐國家有很大的差異，這樣就可以讓我們將中國發展研究與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發展研究進行比較分析。本文主要就是在探討中國大陸「資本原始積累」與農民工流動的關係，從比較的角度分析改革開放以來大量農業生產者與生產資料相分離的過程，整理出中國大陸農民工流動方式與處境的特質，並探討原有的社會主義國家在面對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所出現的角色矛盾與政策調整。

二、資本主義發展與「資本原始積累」

關於資本主義社會發展過程的研究，一直是學術界關心的議題。

在從前資本主義社會走向資本主義社會的過程中，Karl Polanyi (1944) 曾經指出將要經過一個「鉅變」(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的階段，在市場建立的過程中，國家必須扮演積極介入的重要角色，否則市場將無法建立。Barrington Moore (1966) 則從前資本主義社會的階級結構分析著手，探討不同社會的階級結構差異如何影響日後各國資本主義發展模式與民主政治的演進過程。

不過，在研究資本主義發展這一議題上還是要數馬克思成果最為豐碩，《資本論》正是集其研究大成之巨著。馬克斯在研究資本主義社會時，是將它視為一種生產方式 (mode of production) 或社會經濟型態 (social formation)，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一書的序言中對此有深入的說明：「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會生產中發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們的意志為轉移的關係，即同他們的物質生產力的一定發展階段相適合的生產關係。這些生產關係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結構，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築豎立其上並有一定的社會意識形式與之相適應的現實基礎。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相反，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1859:8)。

在資本主義社會，商品生產成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特質，這裡所謂的商品生產是包括勞動力生產在內，亦即僱傭勞動生產，這一生產方式創造了資本家與工資勞動者這兩個階級。馬克思對這種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曾有如下描述：「我們稱為資本主義生產的是這樣一種社會生產方式，在這種生產方式下，生產過程從屬於資本，或者說，這種生產方式以資本和僱傭勞動的關係為基礎，而且這種關係是起決定作用的、占支配地位的生產方式」(馬克思，1861:151)。

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產生的基本前提，是存在大批喪失任何生產資料但有人身自由的無產者及為組織資本主義生產所必須的巨額貨幣財富。它的形成有賴一個暴力的「資本原始積累」過程，這樣才能將直接生產者轉化為僱傭勞動工人，同時把貨幣轉化為資本。

因此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確立以前，會出現「資本原始積累」的過程，所謂「資本原始積累」概念具有兩重意義：一是財富的集中，提供工業化最初資本積累的來源，二是「自由」勞動力的形成，為僱傭勞動生產創造基本的條件。馬克思對於這一過程曾有如下描述：「大量的人突然被強制地同自己的生存資料分離，被當作不受法律保護的無產者拋向勞動市場。對農業生產者即農民土地的剝奪，形成全部過程的基礎」（1867:784）。「只有當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的所有者在市場上找到出賣自己勞動力的自由工人的時候，資本才產生」（1867:193）。

馬克思強調，在尚未經歷過資本原始積累過程前，資本與自由勞動力都不可能自動出現，「貨幣和商品，正如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一樣，開始並不是資本。它們需要轉化為資本。但是這種轉化本身只有在一定的情況下才能發生，這種情況歸結起來就是：兩種極不相同的商品所有者必須互相對立和發生接觸；一方面是貨幣、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的所有者，他們要購買別人的勞動力來增殖自己所占有的價值總額；另一方面是自由勞動者，自己勞動力的出賣者，也就是勞動的出賣者。自由勞動者有雙重意義：他們本身既不像奴隸、農奴等等那樣，直接屬於生產資料之列，也不像資耕農等等那樣，有生產資料屬於他們，相反地，他們脫離生產資料而自由化了，同生產資料分離了，失去了生產資料。商品市場的這種兩極分化，造成了資本主義生產的基本條件。資本關係以勞動者和勞動實現條件的所有權之間的分離為前提。資本主義生產一旦站穩腳跟，它就不僅保持這種分離，而且以不斷擴大的規模再生產這種分離。因此，創造資本關係的過程，只能是勞動者和他的勞動條件的所有權分離的過程，這個過程一方面使社會的生活資料和生產資料轉化為資本，另一方面使直接生產者轉化為僱傭工人。因此，所謂原始積累只不過是生產者和生產資料分離的歷史過程。這個過程所以表現為“原始的”，因為它形成資本及與之相適應的生產方式的前史」（1867:782-783）。

中國大陸目前正在走向資本主義社會，大批農民每日被迫離開土地，汲汲尋求工作機會。因此，「資本原始積累」是一個分析中國大陸資本主義發展與農民工流動等現象很好的概念，可惜目前學術界從資本原始積累這個角度來分析中國大陸農民工的研究還很少見。

柯志明與 Mark Selden 的〈原始積累、平等與工業化－以社會主義中國與資本主義台灣為案例之分析〉(1988) 是台灣最早以「原始積累」這個概念來比較中國大陸與台灣在 1950 年代工業化前夕資本積累的異同。柯志明與 Mark Selden 的論文原以英文發表²，後來才翻譯為中文在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發表。在英文版中他們是以「初始積累」(original accumulation) 這一概念來探討兩岸工業化之初資本積累的方式與來源，但在翻譯為中文時，卻改為「原始積累」這個名詞，因此引起了很大的爭議與誤解³。

「初始積累」這個概念是指工業化初期所需要的資本積累⁴，是一個經濟學的概念，並未涉及農村勞動力轉化為自由勞動力這一社會過程的討論，因此其討論的深度與廣度都無法與「資本原始積累」這個概念相比。

「資本原始積累」的概念不只是在探討工業化所需的資本積累問題，它還涉及到雇傭階級的產生過程，吳介民(2000)雖然使用「有中國特色的原始資本積累」來描述中國大陸出現的農民工問題，但他論文主要的焦點是在強調農民工所遭遇到的種種不合理待遇，並且將這些不合理的待遇主要歸因於舊體制所造成的，並沒有從資本主義發

2. Mark Selden and Chih-ming Ka, "Original Accumulation, Equity and Late Industrialization: The Case of Socialist China and Capitalist Taiwan," *World Development*. 1986(14:10/11):1293-1310.

該文後來並被收錄在 Mark Selden 的專書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hinese Development* (1993).

3. 金寶瑜在隨後出刊的台灣社會研究季刊上(1989)敏銳地指出中文版在使用「資本原始積累」這個概念時與馬克思原意的差別。

4. 正是因為使用「初始積累」這個概念，柯志明與 Mark Selden 才能針對 1950 年代工業化前夕的資本主義台灣與社會主義中國大陸的工業化資本(金)積累進行比較分析。

展過程中生產者與生產資料分離的角度來分析問題。

在台灣學術界，鄭怡雯（2002）是少數從中國大陸勞動力市場的建立這一角度來分析農民離鄉進城的意義與影響，她敏銳地觀察到勞動力市場建立與資本主義發展的關係，並且指出中共當局如何利用各種政策調動農民進出城市勞動力市場，以避免影響城市勞動者的工作機會，達到既建立一個勞動力市場又能維持城市社會安定的目標，這樣的成果當然是以大量犧牲農民工權益為代價所換來的。

鄭怡雯雖然注意到中國大陸勞動力市場與資本主義發展的關係，但她還是集中在強調原有的社會主義體制對於農民工的種種不公平待遇，未能進一步探討中國資本主義發展與資本原始積累所具有的特質對於農民工流動的影響。

另一方面，中國大陸學術界對於資本主義發展的過程與理論非常熟悉，但由於中共當局一直不願承認中國大陸正在走向一個資本主義社會，這種政治上的禁忌，使得中國大陸的學者大都不願以資本主義發展的理論或「資本原始積累」的概念來分析中國大陸社會的變化。少數學者只能用工業化或工業時代來代替資本主義化，作為分析中國大陸農村變遷農民處境的重要概念（潘維，2003）。有些學者如溫鐵軍（2001）雖然使用資本原始積累這個概念，但他在使用這一概念時事實上是在分析中國大陸工業化的「資本的積累問題」，其涵義與柯志明和Mark Selden的概念相似，也是在探討中國大陸工業化所需的資本積累問題，並沒有觸及雇傭勞動階級產生的問題。

目前出走海外的何清漣（1994, 1997）可能是中國大陸少數以「資本原始積累」概念分析當前大陸社經變化的例外者，但她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探討國營企業資產遭到盜賣這一部份，並沒有討論到「資本原始積累」如何影響農民被迫離鄉背井，轉化成自由勞動力的過程。相對於中國大陸國營企業的職工由鐵飯碗淪為自由勞動力，轉化為自由勞動力的農民數量遠遠高過國企的職工，因此對於「資本原始積累」過程中農民工研究的重要性要高於國企職工的研究。

徐小洪的研究雖然是從資本原始積累的角度來分析中國大陸資本家與雇傭工人形成的過程，但一般馬克思主義學派的學者在探討資本原始積累時都是對資本原始積累的殘酷過程持批判的態度，徐小洪卻是將批判的矛頭對向舊有的體制對於勞動者的限制，並且高度歌頌原有的農民工與國企工人變成雇傭勞動工人所具有的時代「進步」意義，他不斷強調「勞動力成爲商品是勞動者成爲“全面、自由發展的人”的必經之路，是實現生產力極大、充分發展，人全面發展的“自由人聯合體”社會的必經之路」，「勞動力成爲商品，使市場競得以最大限度地發展，使勞動力得到市場的有效配置」（徐小洪，2004: 125），這樣的論點實在與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有著很大的背離。

在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資本原始積累」會是很重要的階段，因爲只有透過這個積累過程，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才能建立起來。因此使用「資本原始積累」這個概念與相關理論是分析中國大陸資本主義發展與農民工流動很好的切入點。

但從前面的文獻檢閱中我們可以發現，使用「資本原始積累」的概念與理論來分析中國大陸農民變成工人過程，還有很大的研究空間可以發展。

三、中國「資本原始積累」的特質

馬克思在《資本論》探討「資本原始積累」時，主要是以英國的歷史發展經驗爲分析的實例，馬克思就說過：「這種剝奪的歷史在不同的國家帶有不同的色彩，按不同的順序、在不同的歷史時代通過不同的階段。只有在英國，它才具有典型的形式，因此我們拿英國作例子」（1867:784）。英國主要是以「圈地運動」的方式將農民趕出土地，進行原始積累。

不過，繼英國之後其他國家與地區在經歷資本主義發展時，其「資本原始積累」的經歷都與英國有很大的不同。如1789年法國大革命前，法國貴族基本上就未採取大規模的圈地運動將農民驅離土地，

主要是以對農民加徵地租的方式來增加財富（托克威爾，1994）；在大革命之後成立的資產階級政府最初根本反對農民強佔貴族土地的作法，拒絕承認農民所擁有的土地所有權，因此引起資產階級政府與農民之間的緊張關係，直至拿破崙上台後才承認農民的土地所有權。但此舉卻也使得法國成爲一個具有大批小農的社會，對於日後法國工業化的發展有著重大的影響（沈堅，1999）。

同樣地，德國在資本主義發展的初期也仍然存在著大量農民，以致十九世紀末葉、二十世紀初葉德國社會民主黨面對這些農民時卻不知提出何種政策應對（崔之元，2003:195；Salvadori, 1950:56-58）。二次大戰前德國社會民主黨不能吸引小農的支持，使大量農民最終轉向支持新興起的極右翼法西斯主義政黨（崔之元，2003:195-196；Luebbert, 1991:282）。

台灣「資本原始積累」也與英國有極大的差異，而與歐陸國家有比較多的相似之處，1949年從中國大陸敗退到台灣的國民黨政府，面對中共在中國大陸農村進行土地革命運動以後，不得不在台灣進行土改，土地改革運動將台灣農村改造爲一個小自耕農的社會，這雖然具有財富重分配的平等效果，但卻不利於「資本原始積累」及資本主義的發展。所以從1950年代及60年代，台灣政府必須採取種種不利於農民的政策，這些政策包括不等價的換穀制度、糧食收購價格調降等，以迫使農家中的多餘勞動力離開土地，成爲「自由」勞動力⁵。英國的「資本原始積累」過程充滿著「血與火」（馬克思，1867:783），相對來說，台灣的原始積累過程要較爲平和，但對於許許多多被迫離開土地進城的農家子弟而言，也是充滿著血與淚的。

二次大戰結束後，部分新興獨立的第三世界國家與二次大戰的戰

5. 在尚未成爲政治人物前，農經學者李登輝曾經在1970年的一場有關台灣農村經濟問題的座談會上清楚地指出台灣當時政策對於農民的影響：「政府有意壓低農民所得，爲的是讓那些務農的人移轉到工業上去。」此處轉引自陳玉璽《台灣的依附型發展—依附型發展及其社會政治後果：台灣個案研究》（1992:133）。

敗國（如日本）也曾進行某種形式的土地改革⁶，這就使這些國家日後的政經發展經驗會與未曾進行土改過程的國家有很大的差別。

中國大陸在進行資本原始積累過程時，其性質較接近這些經過土地改革的第三世界國家，平等性更高過這些地區，也是先在1980年代初期實施某種農村土地改革，農村家庭承包責任制的推動，正是將大量土地分給農民，創造一個以小白耕農為主體的農村社會，然後再逐步的採取各項政策工具迫使農民離開土地，其過程比較接近台灣過去的發展經驗。

造成中國大陸與其他資本主義發達國家「資本原始積累」過程的另外一個差異，在於中國大陸的「原始資本積累」除了在農村中熱烈地進行外，同時城市領域也出現資本原始積累的過程，這是與中國大陸原先所具有的社會主義特質有著密切關係。

由於從1949年以後中國大陸長期採取社會主義發展道路，進行社會主義式的工業化，建立起大量國營企業。這些全民所有制企業的職工享有從搖籃到墳墓的各項社會福利保障，但隨著中國大陸的改革已經朝資本主義方向發展後，國營企業的改革也就提上改革的議程。從1997年以來的連續數年間，中國大陸每年都有超過一千萬以上的國企職工被迫下崗，離開工作崗位，淪為自由勞動力。

中共對於國企所進行的改革，從資本主義發展的角度來看具有雙重意義：（一）下崗職工成為「自由勞動力」，有助於資本主義勞動力市場的形成，使資本獲得大量的廉價勞動力。（二）國有資產「化公為私」淪入少數人手中，達到財富集中的目的。

作為一個較後期才進行工業化的社會主義國家，當前中國大陸

6. 戰後亞洲許多非社會主義國家推動過土地改革，但只有日本、韓國與台灣的土地改革取得比較大的成績，這些地區進行土地改革的原因很多，其中一項共同的原因就是反共的考量。也因此日、韓、台三地的土地改革都有限，嚴格說只是農地改革，而非真正的土地改革，並沒有觸及土地私有制所有權的徹底變更，只是限制在扶植自耕農的範圍內。關於農地改革與土地改革差異的分析，參見劉進慶《戰後台灣經濟分析》（1990:110）。

「原始資本積累」具有如下的特質：（一）積累主要來自於國內，並未採取資本主義發達國家曾經使用的對外侵略方式來取得資本積累。（二）積累之初並沒有進行圈地運動，反而進行土地改革，造成大批小農的產生。（三）國企職工下崗。（四）公有資產遭到賤賣與盜賣。（五）大量外資擁入。

不過，受到研究時間與條件的限制，本文基本上只處理「資本原始積累」與農民工關係的探討，關於城市國企有企業職工下崗與公有資產賤賣等議題，必須另闢專文探討⁷。

「資本原始積累」過程會引發大規模的農民工流動，這使得我們對於中國大陸農民工研究可以將它放在移民研究的範圍來討論，將中國大陸農民工流動視為是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出現的城鄉之間流動的境內移民（internal migration），許多學者正是從城鄉流動的角度來研究中國大陸農民工的流動（Davin, 1999）。

在探討農民工流動時有兩組概念必須加以釐清：（1）非農化與城市化。所謂非農化是指農民脫離土地轉移至其他非農產業的過程。傳統中國一直是一個人多地狹的農業國家，大量農民被限制在土地上耕作，農業生產力又低，因此近代以來中國農民生活水平一直都只能在生存邊緣徘徊，許多學者早就指出農民只有從非農產業中才能獲得較高的收入（黃宗智，1994；費孝通，1994），人民朝非農化方向移轉是重要的出路。如果不能出現農民朝非農產業轉移，廣大農民就只有被限制在土地上，以更密集的勞動投入農業生產，維持家戶的生存與溫飽，這就是黃宗智（1994）所謂的內捲化或過密化（involution）⁸，

7. 關於資本原始積累在城市發展過程及其對國企下崗職工影響的討論，參見黃德北〈國企改革與下崗工人：中國大陸勞動力市場建立的政治經濟分析〉（2006）。

8. 過密化原是 Gillford Geertz（1963）在研究爪哇農業時提出的一個概念，黃宗智（1986, 1994）將此一概念應用在解釋華北與江南農村發展所出現的問題：由於人口增加及耕地減少產生對土地的壓力，迫使農民在投入土地生產時，不得不以單位勞動日邊際報酬遞減為代價換取單位面積勞動力投入的增大，導致中國農村普遍存在「沒有發展的增長」，並使小農生產遲遲未被節省勞動力的資本化生產所取代。

形成沒有發展的增長。

城市化是涉及農民離開農村像城市轉移的過程，農民脫離農業生產轉入非農產業，並不意味著就必須進入到城市工作，所以非農化與城市化並不應該劃上等號。農民轉移至非農產業的途徑可以分為就地轉移以及向城市流動的異地轉移，在下面的分析中我們機會發現，1980年代中國大陸非農化的方式多是以就地轉移為主，1990年代的轉移則逐漸以向城市流動的異地轉移為主。

(2) 工業化與資本主義化。資本主義化是指一種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建立的過程，所謂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是指一種雇傭勞動生產的社會經濟型態，即社會上主要由廣大的不擁有生產資料的受僱階級與一小批擁有生產資料的資本家所組成。基本上，這樣的社會必須是在工業化完成後才能進入到成熟的階段，因為只有待工業化完成、大規模的機器生產方式建立，才能徹底摧毀家庭手工生產，達到生產者與生產資料相分離的過程。在前資本主義社會，雖然某些社會（如傳統中國的宋代與明代社會）也曾出現相當規模的手工工場式的雇傭勞動生產，但它卻無法成為主流，因為手工工場畢竟不是工廠式的機器生產，所以歷史上家庭手工生產一直能與手工工場生產長期並存，直到工業革命發生後，大規模的工廠機器生產才將家庭手工生產與手工工場生產淘汰，建立起資本主義雇用勞動生產（保羅·芒圖，1983）。

資本主義化與工業化有著密切關係，但工業化是一個比資本主義化更廣泛的概念，工業化是指大規模的機器生產，工業化可以有很多種類型，資本主義式的工業化是最主要的類型，目前發達國家幾乎都是採取這種資本主義的工業化模式，但前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國家卻是採取社會主義式的工業化模式，中國大陸雖然相當程度受蘇聯模式的影響，但早在1950年代中共經濟發展初期，毛澤東就對於蘇聯發展模式進行檢討，並且強調農村發展的重要性⁹，以後逐漸發展出農

9.關於毛澤東在1950年代對蘇聯發展經驗的檢討，可以參見毛澤東，〈論十大關係〉（1956）及〈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1957）。

村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另外一條道路。不過，蘇聯的社會主義工業化模式到了1980年代已經出現種種問題，並且隨著蘇聯的解體，已經成為歷史雲煙。中國大陸的農村工業化也在1990年代中共官方強迫私有化打壓下，逐步走入歷史。

農民非農化的過程是與工業化有著密切的關係，同時，伴隨著工業化的過程往往會出現城市化發展。這三者關係雖然密切，但卻應該加以區分，中國大陸鄉鎮企業發展的經驗提供我們一個另類的思考方向：工業化不一定要走向西方國家的大規模城市化以及產生許多城市病。

不過，我們一方面不贊成農民轉入非農產業一定要全數進入城市，但同時認為中共早年限制城市化的發展政策也有很多可議之處，因為城市化水平太低會產生許多問題，影響社會、經濟與政治發展。改革開放前，中共雖然推動了一系列的工業化措施，但除了在政權建立初期對於農民轉移至城市採取比較積極的政策外，基本上對於非農化發展卻並未特別重視，1958年1月9日，中共公佈「中華人民共和國戶口登記條例」，該條例對於農民進城做了嚴格的限制：「公民由農村遷往城市，必須持有城市勞動部門的錄用證明、學校的錄取證明或者城市戶口登記機關的准予遷入的證明，向常住地戶口登記機關申請辦理遷出手續」。隨後由於大躍進的失敗，中共開始嚴格限制城鄉之間的流動，因此此後中國大陸的農村人口比重一直未降低，農村人口數量的絕對值更是逐漸攀高，甚至出現「逆城市化」現象，這使得中國大陸的社會結構與二次戰後所有開發中國家都不一樣，城市化程度居於全世界最低的水平，成為全世界絕無僅有的特例。

中國的城市化水平雖然非常低，但在毛澤東統治的晚期，由於農村工業化的發展，因此相當數量的農民已經轉移至農村的社隊企業。根據統計，1978年改革開放前夕，農村社隊企業總共吸納了2800多萬農村工人，佔當時農村勞動力的9.5%（潘維，2003:71）。不過，與整個農村勞動力比較起來，當時社隊企業所能容納的勞動力還是非

常有限¹⁰。尤其從1960到1976年這段期間，另外又有四千餘萬的城市人口遷往農村，更使農村勞動力問題惡化(Kirkby, 1985:107)。廣大農村勞動力聚集在農業領域，這一現象就使得中國農村一直存在著人多地少的局面，構成中國貧困化的主要原因(溫鐵軍, 2001:116; 孫立平, 2004:300)。

綜合上面的分析，我們可以歸納出中國大陸農村勞動力轉移分為就地轉移與異地轉移兩種模式，這兩種轉移模式構成中國大陸農村勞動力轉移的重要特質。在1980年代，就地轉移是農民轉移的主要模式，即農民主要是採取「進廠不進城，離土不離鄉」的移動模式，即使有農民離開本鄉，主要的流動地點集中在本省之內。但1990年代以來，異地轉移已經成為農民流動的主要模式。鄉鎮企業已經無法再容納大量農村剩餘勞動力，所以農民工必須進行遠距離的流動。在下面的討論中我們可以發現，兩種轉移方式不但涉及流動距離的遠近，兩種模式下農民工的待遇也有很大的差異。

四、農村社區工業與農民的就地轉移

農村改革是中國大陸一步步朝向私有化方向發展的開始，農村家庭承包責任制的實施基本上是中國農村土地私有化的第一步，不過，當時鄧小平及其他支持改革的中共領導人顯然都並未意識到這場改革所具有的意義。

韓丁(William Hinton)這位曾經在1950年代目睹中國大陸歷經土改過程的美國工程師(Hinton 1966)，是最早觀察到中國大陸農村改革是朝向私有化方向發展，並最終會將中國帶向脫離社會主義發展

10. 本文的一位審查者曾經指出：在探討毛澤東時代農村工業化進展遲緩的原因時，應當考慮到中國大陸當時所處的國際政治經濟環境因素。確實，在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圍堵下的社會主義國家，必須被迫將社會大部分的積累投注在發展重工業與國防工業，但重工業與國防工業都是屬於資金高積累與回收期長的產業，因此採取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政策，將會嚴重的限制農村勞動力吸納的能力。

的道路¹¹，可惜他的非學院出身背景使得他的觀察最初並未受到學術界應有的重視。

在農村生產由集體生產轉向以家戶為生產單位的過程中，農村剩餘勞動力的問題逐漸浮現出來，因此中共開始放寬農村勞動力的流動管制。1981年中共中央、國務院首先發布「關於積極發展農村多種經營的報告」，規定農民只要完成集體任務，放寬農民從事非種植業的限制，開始有大量農民轉移到漁、林、牧、副等其他行業。同時，這段期間，由原有的社隊企業轉化的鄉鎮企業，蓬勃發展，更使大批農民從農業部門轉移至非農產業。到1986年，農村非農產業產值已超過農業產值，改變了過去以農業為主體的農村產業結構。

在整個1980年代，農村剩餘勞動力的流向主要是向鄉鎮企業轉移。因此農村是否存在蓬勃的鄉鎮企業成為農村容納剩餘勞動力與農村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但許多地區的農村，在實施農村家庭承包責任制時，往往也將集體經濟拆解拍賣，因此並不存在強大的鄉鎮企業，一旦沒有鄉鎮企業做後盾，農村的發展將會受到限制，落後、腐敗與缺乏建設將成為這些地區的主要特徵，潘維對此作了最深入的分析：「在回歸家庭耕作較晚也不太徹底的地區，農村幹部通常能有效地領導和組織農民。在這些地區，社區紐帶往往更強，集體有能力建設成本高昂的基礎設施，鄉鎮企業更發達，腐敗也不那麼普遍，社會秩序比較穩定。相反，在那些較早也較徹底地回歸家庭耕作的地區，農村基層政權受到嚴重削弱。在這樣的村或鄉，社區紐帶往往被破壞，農村集體無力建設基礎設施，鄉鎮企業發展不起來，幹部很容易變得腐敗自私，農民們在市場經濟中損失慘重，社會秩序也因此不穩定」（潘維，2003:19-20）。Jean Oi（1992）也認為，農村集體經濟的存在提供了地方政府很好的物質基礎，使其能夠在地方扮演積極主導

11.Hinton 在1990年出版的專著 *The Great Reversal: The Privatization of China, 1978-1989*。正可代表他對於中國農村改革性質的看法。



經濟發展的角色。農村鄉鎮企業的快速發展，更是1980年代中國大陸經濟高速起飛成長的最重要動力來源（Oi, 1999）。

因此，農村的集體經濟發達與否是影響農民流動的重要因素。集體經濟發達的地區，農民流動可以以就地轉移為主，集體經濟不發達的地區，農民可能只有往異地轉移的方向流動。曹錦清（2000）在河南開封附近的農村所做的田野調查，清楚地顯示農村是否存在集體企業與農民流動之間存在著密切的關係。

其次，農民往鄉鎮企業轉移，只是脫離農業生產，但並不一定就淪為雇傭勞動者，因為許多農民是進入自己所屬農村的鄉鎮企業工作，一方面成為受僱者，但某種意義上也是鄉鎮企業的股東。即使是到非本鄉本村的鄉鎮企業工作，這些農民所受到的待遇往往也比在私人企業要好得多（潘維，2003）。

潘維指出：在改革初期，中共對於社隊企業的發展並非採取支持的態度，反而採取打壓與緊縮政策，直到1983年以後才逐漸肯定社隊企業的重要性，並承認其貢獻。一旦政府對社隊企業的整頓政策取消後，社隊企業就以驚人速度成長，如1982年社隊企業職工總數為3112.9萬人，1983年社隊企業的職工總數稍增為3234.6萬人，但1984年就增至5208.1萬人。此後直到1989年鄉鎮企業一直成為吸納農村剩餘勞動力的主要管道（潘維，2003:92-101）。

1980年代初期，配合農村家庭承包責任制的實施，中共一連串提高農產品收購價格與壓低農業生產資料價格政策的出籠，提高了農民種糧的積極性，並使得農民生活大為改善。不過，如果繼續讓農民生活改善，農民勢必永遠留在農村土地上，將不利於中共所推動的現代化及吸引外資的進程，尤其從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以後，中共更積極開展城市經濟體制的改革，因此改革以來偏重農村的政策勢必需要加以扭轉。

1985年以後農業政策逐漸不利於農民，因此離開土地的農業勞動力人數與速度都在加快。同時，中共官方所採取的一連串對於流動

人口管制政策的放寬，也加速農民朝城鎮化方向的流動。這些政策包括：1984年國務院頒布「關於農民進入集鎮落戶問題通知」，規定：「允許務工、經商、辦服務業的農民自理口糧到集鎮落戶」，允許農民進入縣以下的集鎮落戶，為城鄉隔離體制打開了一個小小的窗口。也就是在農民與城市居民之間開創了另一種戶籍人口：自理口糧的農民可以進入集鎮落戶，但國家並不負責提供他們城市居民所享有的待遇。

更重要的政策變化是對戶口制度管理的放寬，以「放鬆」¹²對農村剩餘勞動力流動的管制。早在1980年代初期，在深圳等經濟特區就開始實施暫（寄）住戶口制度，以後逐漸在廣州、汕頭等開放城市推廣，至1985年7月公安部發布「關於城鎮暫住人口管理的暫行規定」，更為出外打工的流動人口戶口問題得到進一步解決。外出打工的農民從此能在不變更戶籍身分的情況下，以臨時身分在城市停留¹³。

1986年，中國大陸又宣布實施身分證制度，以及公安部門放寬對農民進城的限制，使得農民此後不必再經由農村地方黨政機構開立介紹信，光憑身分證就可自由離開農村，進入城市經商、務工或尋找其他工作機會，更進一步解除了農民流動的限制。

與此同時，隨著中國大陸經濟的快速發展以及對於人口流動管制的放寬，鄉鎮企業的資本有機構成比重卻日益提高，在1985年鄉鎮工業企業平均每個勞動崗位需佔用的固定資產原值為1653.94元人民幣，但至1992年則上升到6726.03元人民幣，也就是七年之間資本有機構成提高了4倍（孫立平，2003:106），自然限制了鄉鎮企業吸

12. 1980年代中共對於農村勞動力離鄉進城採取了一連串放寬戶口管制的規定，使農民流動變得容易許多，但因中共基本上並未改變中國大陸二元的戶籍制度，農民進城還是受到種種不合理的待遇與限制，因此此處用「放鬆」而非改變農民流動管制來形容這樣的變化。

13. 由於辦理流動戶口的手續仍很繁瑣，而且收費昂貴，因此還是有相當數量的農民工不願辦理登記，根據中共公安部估計，1995年的流動人口為八千萬，但向公安機關登記的暫住人口只有四千四百萬人（王建民、胡琪，1996:41）。

收農村剩餘勞動力的能力。尤其到1990年代外資的大量湧入中國大陸、私營經濟的興起以及國營企業經營上的困難¹⁴，都使得鄉鎮企業的經營面臨到愈來愈多的困難，中共十五大以後更全面強迫農村進行鄉鎮企業的所有制改革，大量鄉鎮企業被迫淪為私人所有，鄉鎮企業再也無法成為吸納農村剩餘勞動力的主要來源。愈來愈多的農民開始被迫要以進入城市打工的方式轉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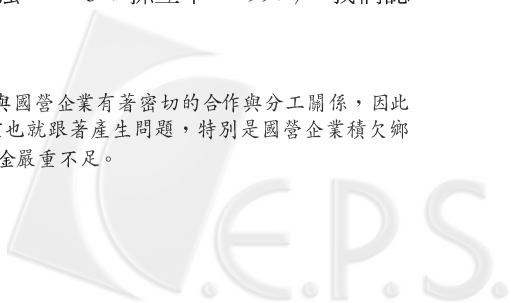
1980年代大陸傳媒與民眾多用「盲流」這樣不友善的字眼來形容進城的農民工，但到了1990年代以後，媒體逐漸以「農民工」、「民工」、「流動人口」等中性的字眼描述進城打工的農民。這樣的變化顯示農民工已經成為城市勞動的普遍現象，甚至是城市居民日常生活中重要的協助來源。

五、城鄉隔離體制與農民異地轉移

從移民研究角度來分析中國大陸農民工問題在學術界已經積累了很豐富的成績。農民為什麼要離開農村、以及為什麼要進城？這是農民工研究的學者最主要的討論焦點，許多中國大陸學者受到美國移民研究的影響，研究集中在農民離土的推力（push）與進城的拉力（pull）上，早期的推拉理論研究多偏重在分析移出地的消極因素如何構成推力以及移入地的積極拉力因素，兩者影響移民的流動；但晚近的推拉研究則強調移出地與移入地都存在一些消極與積極的推拉因素影響移民的流動。

許多學者在探討中國大陸農民工離鄉進城的推拉因素時，多將這種推拉因素與城鄉隔離體制聯繫在一起，分析這些制度因素對於農民離鄉產生的積極與消極影響（李強，2003；孫立平，1997）。我們認

14. 潘維（2003:329-330）指出：鄉鎮企業與國營企業有著密切的合作與分工關係，因此當國營企業經營遭遇困難時，鄉鎮企業也就跟著產生問題，特別是國營企業積欠鄉鎮企業大量貸款，造成鄉鎮企業流動資金嚴重不足。



為探討這些制度因素的推拉影響時，應該把它們放置在政府的發展策略與經濟發展的脈絡中進行動態的思考，這樣才能理解為什麼某些制度因素在特定的時空環境下會成為推或拉的因素，但在另一個時空環境下卻不再產生影響。

中共在發展策略上一向有偏袒都市 (urban bias) 的特色，中共一方面給予城市居民享有各種優渥的社會保障與福利，同時又不願城市規模過於擴張，以免造成國家財政的負擔及像西方資本主義發達國家所出現的城市貧民窟等問題發生 (Kirkby 1985)。因此限制農民進城就成為中共自大躍進失敗後一直採取的政策，配合這套政策的實施則是城鄉隔離體制的建立。

中共在 1950 年代初建立的戶籍制度原先的目標可能是：「證明公民身分，便利公民行使權利和義務；統計人口數字為國家經濟、文化、國防建設提供人口資料；發現和防範反革命和各種犯罪份子活動，密切配合鬥爭」（陸益龍，2003:122），但由於這套戶籍制度將戶口登記分為「農業戶口」與「非農業戶口」，並與糧食、住房、醫療、教育機會以及其他社會經濟利益掛鉤，因此強化了城市與農村的差別，使得不同類型的戶口、不同地區的戶口與不同規模的城市戶口之間，出現權利、收入、地位和社會聲望的等級差別（陸益龍，2003:112；Cheng and Selden, 1994），於是不得不採取隔離的措施，以維持這種等級的權利關係。

1980 年代中期以來，中共逐漸放寬了農民進城的若干限制，城鄉隔離的體制也隨之出現一定程度的鬆動，但基本上並未改變。因此城鄉隔離體制為農民進城創造了一些推拉的積極與消極因素。

城鄉隔離體制對於進城農民要長期待在城市增加了許多制度性障礙，以致每年有高達數千萬的農民工要往返於城鄉之間，而非一次性的完成農民流入城市的過程，許多農民工事實上是屬於移民工研究中所謂的「客工」(guest worker)，客工往往不能像本地勞工一樣享有同等的待遇，不過其他國家的客工大都是指從外國前來本國打工的短

期勞工，因此不給他們享有本國的公民權利¹⁵，不像中國大陸的農民工性質上是屬於國內城鄉流動的客工，卻不能具有本國城市居民的公民身分與權利。Dorothy Solinger (1998) 就從公民身分 (citizenship) 的角度探討中國大陸農民工與城市居民之間所享有的待遇差異，她的研究詳細的指出了城鄉隔離體制所存在的各種制度性歧視，使得農民工並不能享有像城市居民一樣完整的公民權利。Anita Chan (2001) 在分析中國大陸工人遭到種種不合理待遇時，也顯示多數受害的個案都是農民工。

這種二元的戶籍制度使得進城的農民工遭受各種歧視性的待遇，其中最主要的問題在於醫療、子女教育、居留與就業等方面。關信平、姜妙屹 (2003) 的研究就指出外來人口在就醫上所面臨的困難，雖然從 1990 年代末葉中共已經針對城市居民建立起一套社會保險式的醫療保障體制，但農民工基本上都沒有參加醫療保險，一旦有病往往是到小醫院或私人醫院治療，或自行買藥解決，他們所能負擔的醫療費用大約在 100 元人民幣左右，因此基本上沒有條件去大醫院看病。同時，農民也無法享受到社區衛生服務。例如朱力 (2002:203) 就指出：南京市的農民工子女原來甚至無法取得當地兒童一樣的預防接種卡，懷孕婦女也不能在當地進行例檢，直到南京大學社會系在 1995 年進行專題調查反應這些問題後，次年 5 月問題才得到解決。

韓嘉玲 (2003) 與周皓 (2001) 則對進城農民子女的教育問題作了深入的分析，農民工子女無法進入城市公立學校就學是一個非常困擾農民工的問題，於是許多外地人員開始「自力救濟」，興辦起專門招收農民工子女的民辦簡易學校，以滿足農民工子弟就學的需求。從 1990 年代中葉起¹⁶，這些被民眾俗稱為打工子弟學校日益增加，崔傳義 (2003) 就指出，1999 年 4 月北京市共有民工子弟學校 114

15. 關於各國對客工待遇的比較研究，參見 Hahamovitch (20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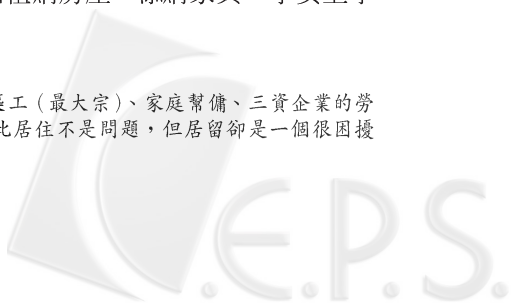
16. 韓嘉玲 (2003:210) 指出，北京市最早的打工子弟學校大約在 1993 年前後成立。

所，學生總數 1.07 萬人；2001 年 4 月僅北京市豐台區一個區就有 57 所打工子弟學校，學生近萬人。打工子弟學校普遍設立雖然基本上解決了多數民工子女就學的問題，但因打工子弟學校屬於體制外的學校，因此農民子女的就學品質與保障仍然有很大的問題。雖然中共國家教委在 1998 年 3 月 2 日頒布「流動兒童少年就學暫行辦法」，為簡易學校的創辦提供必要的法律依據，但許多地方政府卻並未據此制定相應的實施細則，仍然沒有給予這些學校相關的法律保障（周皓，2001）。

居住（留）也是農民的很大問題¹⁷，理論上農民工雖然不具有城市戶籍，但可以辦理暫住證的方式留在城市，取得暫住的合法身分至少需要辦理三種證件（身分證、暫住證與勞動就業證），朱力（2002:202）指出，要同時擁有這些證件，農民工必須繳納各式各樣的費用：暫住人口管理費、治安管理費、村管理費、原籍地外出務工人員管理費、原籍地計劃生育管理費、教育附加費、防洪基金、三項基金等，金額高達一千多元人民幣。許多農民因無法負擔這些費用而未辦齊三種證件，因此處於一種模糊的合法灰色地帶，一旦地方政府進行「嚴打」治理時，常常會遭到公安部門逮捕收容遣送回原籍。

農民工所受到的這些歧視待遇，使得農民工成為城市的弱勢者與邊緣化的團體，這對於農民的流動有著相當負面的影響：農民工往往必須以個人身分前往城市工作，不便以家庭化的方式舉家遷移。但是農民工如果單獨進城，為了存錢接濟家人，因此往往不願意消費或消費能力有限，對於城市經濟發展的助益不大，並會限制城市進一步容納人口進城的能力。反之，農民工如果是舉家進城，為了安家落戶，農民工會有相當規模的消費，如租購房屋、添購家具、子女上學

17. 進城的農民工中主要從事的工作集中在建築工（最大宗）、家庭幫傭、三資企業的勞工等行業，這些雇主大都會提供住宿，因此居住不是問題，但居留卻是一個很困擾他們的問題。



和日常生活開銷等，對於城市經濟將會有具體貢獻，並能進一步增加城市吸納人口進城的能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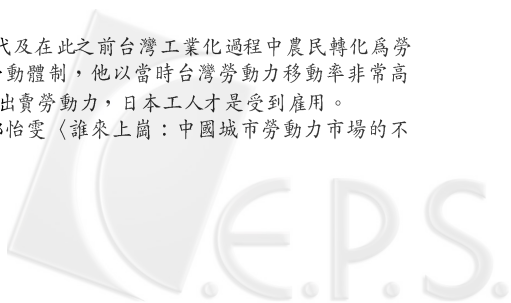
城鄉隔離體制對於工作最重要的影響就是「進城農民不允許失業」（鄭杭生等，1997:202），否則就會遭到收容與遣返回原籍的處分。此外，城鄉的隔離體制造成二元分割的勞動力市場，農民工基本上只能在城市的次級勞動力市場（secondary labor market）工作，不論是待遇與勞動條件都要比城市居民差。尤其農民工的工作缺乏保障，總是處於高度流動與不穩定的狀態。因此，我們可以說：中國大陸的農民工只是在出賣勞動力，並未真正被雇用¹⁸。

另一方面，城鄉隔離體制還使得地方政府常將農民工當作城市勞動力市場調節機制，當城市缺乏勞動力時，就大肆開放農民工進城打工，但如果出現城市居民就業困難時，就限制農民工工作的工種，甚至開始積極針對無證農民工進行檢查與掃蕩，將農民工收容審查遣返。1990年代後期以來，國營企業改革成為中共政策重點，大量國企職工被迫下崗，解決城市下崗勞工就業問題成為地方政府首要任務，於是許多城市紛紛採取「騰籠換鳥」¹⁹政策，規定某些勞動條件比較好的工種保留給城市居民，企業不得雇用農民工，以保障城市居民的就業。

影響農民工流動的另外一個推拉因素是農村的土地制度，農村家庭承包責任制的實施，同時具有推與拉的效應。首先，農村家庭承包制實施後，農村剩餘勞動力的問題才得以浮現，但當農業生產變成以家戶為單位的小自耕農生產後，卻也使得農民最初對於離土進城缺乏積極的誘因，他們寧願過著自給自足的生活。1985年農產品收購價

18. 陶谷三喜男等（1993）在探討1980年代及在此之前台灣工業化過程中農民轉化為勞動力過程時，比較當時台灣與日本的勞動體制，他以當時台灣勞動力移動率非常高及缺乏保障為據，形容台灣工人只是在出賣勞動力，日本工人才是受到雇用。

19. 關於「騰籠換鳥」政策的討論可參見鄭怡雯〈誰來上崗：中國城市勞動力市場的不平等競爭〉（2002）。



格及其他農業政策不利於農民後，越來越多的農民才開始被迫離開土地。

對於離鄉進城的農民而言，土地承包制度對於他們同時具有推動與制約的因素。正因為家庭承包責任制分配到的土地對於農家所產生的保障作用，使得許多農民膽敢離開家鄉進城尋找工作機會，但農村的土地制度也可能成爲一項將進城農民推回農村的的因素。

由於城市種種歧視農民工的政策，極不利農民工長期停留在城市，因此許多農民進城一段時間後往往會重新返回農村，尤其農村的土地制度可以保障農民回鄉後還有地可耕，更加強了農民返回農村的強烈動機。但農村的經濟困局又使許多回鄉的農民必須再度離鄉進城來尋找工作機會，因此有些學者用「候鳥式流動」（白南生、何宇鵬，2003）來形容農民工在城市與農村之間不斷往返。同時，由於無法獲得如城市居民所具有的各项社會福利保障，使得進城的農民不得不繼續與土地維持一定的關係，不敢完全擺脫與土地的關係。這樣的心態，對於農村土地朝集中化發展，自然也有不利的的影響。

有些學者因此力主推動某種形式的土地私有化或市場化（林毅夫，2004；徐漢明，2004），他們認爲土地私有化後可以讓想要離鄉進城的農民將土地轉化成進城的資本，這樣可以加速農民離開土地的速度，也可使土地作更集中的使用。不過，反對土地私有化的聲浪更高（溫鐵軍，2004；吳理財，2004），這些學者認爲：土地的集體所有是當前中國大陸農民最重要的社會保障，一旦農村土地私有化政策得到落實，勢必會對農民現有的生活與生計造成嚴重的衝擊，屆時中國大陸農村剩餘勞動力轉移的模式就與其他資本主義國家的差異變得愈來愈小了。

中國大陸農民工能夠多次來回於城鄉之間徘徊，是與中國的土地制度有著密切關係。由於農村土地採取集體所有制，保證每一位農民都能擁有一定的耕地，使得農村一直維持一個小自耕農社會。這種情形在實施土地改革的台灣也曾出現，只有到第二代或第三代農民分家

後，許多農民工才會成為真正的無產階級。

另一方面，由於中國大陸並未經過類似圈地運動的資本原始積累，因此離開土地的農民是屬於「半無產化」的勞工，而非西歐國家的無產階級，他們與土地繼續維持某種藕斷絲連的關係。根據 Immanuel Wallerstein (1983) 的分析，這種半無產化的勞工反而使資本家能夠對他們做更嚴苛的剝削，因為半無產化的勞工還有其他收入或依靠，因此資本家可以付給他們低於生活基本開銷的更低工資，這些半無產化的勞工也比較不願意採取團結的勞工對抗策略。目前在中國大陸各大城市中大量農民工受到各種欺壓，卻總是以沉默應對，正是最好的寫照。從台灣過去發展的經驗來看，這樣的資本原始積累過程及半無產化的社會結構，使得台灣的社會流動很高，存在大量的自營作業者，對於台灣勞資關係的發展也有很深遠的影響 (Deyo 1989)。隅谷三喜男等 (1993:173) 指出，台灣工人的這些特質，「抑制了台灣正式的工人階級的形成，並使其畸形化」。台灣的這些經驗是否會在中國大陸複製，是很值得注意的。

這種高度的社會流動可以反映在農民進城經商、擔任工匠、頻繁更換工作，以及大量農民返鄉創業。許多學者都指出，農民返鄉創業正在形成風潮 (白南生、何宇鵬, 2003; Murphy 2002)。回流創業者還可在當地農村創造就業機會，根據揚汝岱的報告，1997 年中國大陸農村已有 240 萬農民成為創業者，按每個創業者可以創造五個農民就業計算，回流創業者已安排 1200 萬農民就業²⁰。這為農民就地轉移重新創造了新的機會。不過，相對於 1980 年代農民就地轉移主要是進入鄉鎮企業，這一波的就地轉移則是轉往私人或個體經營的小型企業，這些小型私營企業進入的技術與資本的門檻都很低，因此許多返鄉勞動者都會設法擠進來，希望「黑手變頭家」。這些農村小型私營企業的存在，無疑會更加加深中國大陸農民轉化為勞動階級時所

20. 此處資料轉引自 (白南生、何宇鵬, 2003:9)。



具有的半無產化性質以及缺乏階級意識。

中國大陸的學術界總是用「流動人口」來形容這些離鄉進城的農民工，流動人口意謂著這些人只是暫時的離鄉外出，而非「移民」。不過，隨著時間的延續，離鄉的農民工中有越來越多人已經無法回到農村，即使回到農村還能繼續從事農業生產的人數也愈來愈少。許多農民在青少年時就離鄉進城打工，早已不識農事，因此日後要重回農村進行農業生產的可能性就很低。一些經驗的調查都顯示農民返鄉重新從事農業生產的比例並不高。重返農村的許多農民最後常常必須再重新出來打工，隨著勞動者年齡的增長，重新外出打工的農民工已經越來越不易滿足資方的要求與自己的經濟需求。

六、資本主義發展與國家角色的變化

從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經驗來看，在資本原始積累階段，勞動人民所受到的迫害是非常驚人的。馬克思曾經用「血與火」來形容這樣的殘酷過程，馬克思並且指出：國家在這個暴力的發展過程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國家對資本採取種種偏袒的政策，資本原始積累過程才能順利進行。只有透過這樣的過程，生產者與生產資料才會分離，雇傭階級才能被創造出來，為日後的工業化做好鋪路的工作。

中國大陸的原始積累過程雖然相對比較溫和，使其具有濃厚的中國特色的資本原始積累，但儘管相對比較溫和，仍然是充滿著血與淚。改革之初，中國大陸農民收入有相當程度的提高，但隨著改革的深化，社會主義國家越來越從資本的角度思考問題與制定政策，因此政策日益朝不利於農民的方向擺盪，陸學藝對此有著清晰的描繪：「1979~1984年，農民人均純收入平均每年提高15.1%；1985~1988年增長幅度下降為5.1%；1989~1991年只有1.7%；1992~1996年因國家大幅度提高了農產品的收購價格，收入增長又有提高；但自1997年以後，農產品總量基本穩定，而市場價格這4年下降了30%以上，以務農為主的中西部農民實際收入是下降的」（陸學藝，2002:93）。

除了農業政策愈來愈不利於農民外，農村基層組織的不斷擴大及幹部的官僚腐敗作風也使得農民的負擔變得愈來愈大，改革初期，農村基層組織的幹部人數都有相當的減輕，但隨後就出現不斷的擴張，曹錦清在河南所做的田野調查顯示：許多鄉鎮幹部人數都比人民公社晚期擴大了五、六倍（2000:92），農村組織的擴大同時造成農村財政的困難與債務增加，地方幹部則將種種財政負擔轉嫁到農民身上，各種攤派造成農村的凋蔽與農民的普遍貧困，使得農民只有離開土地到城裡尋求工作的機會。

由於改革開放前中國大陸所實行的計劃經濟體制，使得中國大陸普遍缺乏資金，因此改革開放後最重要的資本來源就是外來資本，外資與中共當局的關係也變得日益密切，尤其是地方政府與外資的關係，李靜君曾經用「恩寵主義關係」（clientalist relations）來形容地方政府官員與外資的關係（Lee, 1998:56）。外資需要中國大陸的廉價勞動力以降低其生產成本，中共當局更需要大量引進外資，維持經濟高度成長，以支撐它所大力推動的改革開放政策的正確性與政權正當性。為了吸引外資來華投資，中共當局給予外資種種優厚的獎勵投資條件，外資對於農民離開土地自然產生很重要的影響。由於外資所需要的是穩定、優質（年輕）與廉價的勞動力，因此年輕的女性農民工成爲外資的最愛。就目前外出農民工的總數來看，中國大陸男性農民工的比例還是要高於女性農民工（白南生、何宇鵬，2003；Davín, 1999），如白南生與何宇鵬針對安徽與四川兩省的外出農民工調查顯示，外出男性與女性勞動力之比爲69.5:30.5（2003:12）。但在某些特殊的地區與產業，我們卻可發現女性勞動者比重高於男性的例子。因此許多第三世界國家普遍出現的移民工女性化現象，在珠江三角洲與外資集中的經濟開發區或經濟特區也可以很明顯的發現有類似的情形（鄔滄萍等編，1996:78；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農村外出務工女性”課題組，2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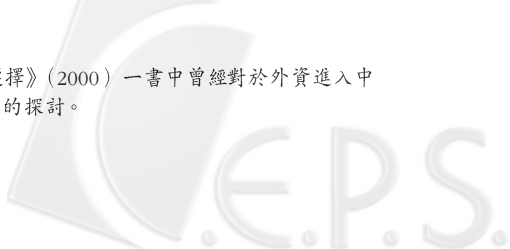
改革開放的一項重要政策目標就是吸引外資，尤其從1992年鄧

小平南巡講話後，越來越多的外資湧入中國大陸，爲了討好外資，國家對農民的政策也就越來越不利，使得農民生活愈來愈困苦。朱冬亮就指出：2000年許多地方的糧價和1990年代中期比較起來，竟然下跌了三分之二（2003:316）。2000年3月當時擔任中共湖北省監利縣棋盤鄉黨委書記李昌平（2002）寫信給中共總理朱鎔基，反映農村面臨的主要問題，他在信中疾呼：「現在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震動中共中央，顯示這種榨取農民的做法已經出現很大的問題，迫使中共不得不面對中國大陸資本主義發展的變化而調整其政策。正因爲農民收入持續下降產生種種問題，甚至可能引發嚴重的社會與經濟危機，所以中共十六大產生的新任領導人胡錦濤與溫家寶上台後特別表現出對農村問題的重視。

隨著外資的大量湧入中國，中國大陸目前已經成爲「世界工廠」，前來中國大陸投資的外資最初主要是著眼於中國大陸的廉價勞動力，將其作爲出口加工基地。不過，有了工廠就代表存在大批受雇者，這些每月有固定薪資的勞動者具有一定的消費能力，因此工廠出現後消費市場也就跟著出現，一旦「世界工廠」在中國大陸建立，「世界市場」也就逐漸誕生。因此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與沿海民眾所得的增加，愈來愈多的外資進軍中國大陸是以打開中國大陸國內市場爲經營目標，中國大陸目前正面臨空前未有的市場競爭局面。

這種激烈市場競爭的結果就是生產過剩與通貨緊縮的出現，許多中國本土企業正面嚴酷的挑戰²¹，尤其中國大陸正經歷「資本原始積累」過程，國家採取不利於農業、農民、農村的經濟政策，以逼迫農民離開土地，達到提供資本（特別是外資）廉價勞動力來源的目的。但此舉卻會使農村日益走向貧困與殘破，窮苦的農民根本無法消費得起世界工廠所生產的各項產品，單靠沿海地區三億城市居民的消費能

21. 韓德強在《碰撞—全球化陷阱與中國現實選擇》（2000）一書中曾經對於外資進入中國大陸導致大量中國民族工業的消亡有深入的探討。



力是不足以消化掉這些源源不斷生產的商品，生產過剩與通貨緊縮就成為過去幾年中國大陸經濟發展最大的威脅。

中共當局目前採取各項鼓勵消費的政策，來解決通貨緊縮的問題。但這只是治標之道，真正的問題還是在於如何解決三農問題，降低農民負擔，提高農民所得與消費能力。如何繼續順利的將農民驅趕出土地之際，又能保證農村的經濟成長與消費能力，成為當前中共領導階層在進行經濟轉型過程中最艱難的挑戰。

當前中共的做法是採取降低農民進城成本的政策，如解決農民工的子女教育、醫療、居住等問題，希望一方面能夠減少農民工的社會成本，吸引農民工願意繼續離土進城，又不會增加資本家的負擔。這樣的政策是否能夠奏效？農民對於最近政策變化的真正感受又是如何？這些問題都需要經過經驗調查研究才能得到更清晰的答案。不過，中共在採取這些政策時，事實上會使自己處於一個矛盾的角色中。

這種矛盾性在於：國家一方面必須繼續提供資本廉價的勞動力，維持經濟成長，因此如何迫使農民離開土地還是當前重要的課題，但同時又必須提高農民所得，使其具有一定的消費能力，解決國內有效需求不足的問題。這種矛盾的壓力可以反映在2003年初國務院辦公廳（2003）發出的「做好農民進城務工就業管理和服務工作通知」上，通知中強調農村富餘勞動力向非農產業和城鎮轉移，是工業化和現代化的必然趨勢。因此要求各級政府加強保護農民工的合法權益，取消對農民進城務工就業的不合理限制，切實解決拖欠和克扣農民工工資問題，改善農民工的生產與生活條件，多渠道安排農民工子女就學及注重農民工其家屬的婦幼保健、衛生防病、法律服務等工作。同時，為了維持農村社會的穩定，通知再度要求地方政府不得強行收回外出務工就業農民的承包地，顯見中共當局一方面要繼續加強推動農民朝非農部門的轉移，同時也認識到對農民工權益保障的必要性。

中共從2002年16大胡錦濤與溫家寶上台後雖然採取一連串比較

有利於農民工的政策，但這些措施卻可能會影響資本原始積累的過程的進展，不利於資本繼續取得廉價的勞動力。2004年夏天，中國大陸各地紛紛出現“民工荒”現象，光是外資主要集中地的珠江三角洲地區，就傳出短缺民工兩百萬人的消息²²，如果這樣的趨勢繼續發展下去，顯然將會影響外資在當地的投資「熱情」，因此勢必會迫使中共當局採取一些手段，繼續提供廉價穩定的勞動力給資本，國家將一直處於這樣的兩難角色中。

七、結論

本文從「資本原始積累」這個角度切入，探討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大陸所出現的農村生產者轉變為雇傭勞動者的過程，這個過程也是農民從農業勞動者轉移至非農產業的過程。由於中國大陸原先所具有的社會主義性質，使得它的生產者與生產資料相分離的過程具有濃厚的中國特色，本文將它與其他資本主義發達國家曾經經歷的過程進行比較研究，希望能對中國大陸資本主義的特質與未來的發展能有更深一層的理解。

非農化是中國發展的必由之路，如果農業人口數量不減少，繼續陷在農業領域，不論農業取得如何卓越的成績，農民仍然只能在溫飽的邊緣上徘徊。即使由國家採取以工養農的補貼，也將不可能發揮太大作用，國家事實上也無法負擔這筆龐大的財政負擔²³。本來非農化可以是社會主義的，也可以是資本主義的，但改革開放前中共雖然堅持走社會主義的道路，卻忽視了非農化與城市化的重要性，以致大量

22. 關於這次“民工荒”現象的報導，參見戴敦峰等，〈中國遭遇20年來首次“民工荒”〉，《南方週末》，2004年7月15日。

<http://www.nanfangdaily.com.cn/zm/20040715/xw/szxwl/200407150005.asp>.

23. 潘維對於以國家財政補貼農民的可行性做了一個很好的比擬：中國大陸農民如果是維持九億數量，國家每月補貼每位農村人口一百元人民幣，一年將達到一萬億，但中國大陸的全年財政總支出也只有二萬億左右（潘維，2003）。

農民滯留在農村與農業，生產力無法提昇上去，農民普遍處於貧困的狀態，這種失敗的結果因而使中國大陸的領導人與民眾對於社會主義的發展模式也失去了信心，改革開放政策最終導致資本主義發展模式的登台。

資本主義的發展使得中國大陸出現「資本原始積累」的過程，這裡我們再度看到一些中國特色，由於家庭承包責任制的實施，使得農民脫離土地的過程比較緩慢與溫和，同時農民的轉移最初主要集中在往鄉鎮企業流動的就地轉移。農村的集體經濟原本可以容納更多的農村剩餘勞動力，但顯然已經不被中共官方所接受，尤其在1990年代後期鄉鎮企業大量私有化後，在地轉移的非農化所能容納的農民工數量變得越來越有限，農民流向城市的異地轉移已經成為農村剩餘勞動力的主要出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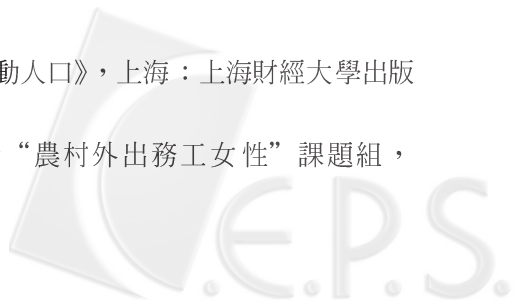
資本主義的發展已經成為中國大陸目前正在走的道路，「資本原始積累」與農民淪為雇傭勞動者也就成為必然的趨勢。但它可能卻是一條農轉非的有效道路，只是這個過程是非常殘酷的。雖然相對於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過程，中國大陸「資本原始積累」還是比較溫和的，許多農民並非立刻成為喪失生產資料的雇傭階級，而是先成為與土地繼續維持藕斷絲連關係的半無產階級，但隨著中國大陸資本主義發展的深化，國家向資本日益傾斜，以致「資本原始積累」的過程愈來愈惡化，農民淪為雇傭勞動者的速度與比重也在加快，當這些中國特色逐漸退色之際，也就是中國的「資本原始積累」宣告完成其過程的時候。

參考書目

中文部分

王建民、胡琪，1996，《中國流動人口》，上海：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

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農村外出務工女性”課題組，



- 2000,《農民流動與性別》,開封:中國農民出版社。
- 毛澤東,1957,〈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毛澤東選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頁363-402。
- ,1956,〈論十大關係〉,《毛澤東選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頁267-288。
- 白南生、何宇鵬,2003,〈回鄉,還是歸鄉?〉,李培林編《農民工:中國進城農民工的經濟社會分析》,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頁4-30。
- 朱力,2002,《中國民工潮》,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 朱冬亮,2003,《社會變遷中的村級土地制度》,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
- 托克威爾,1994,《舊制度與法國大革命》,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 何清漣,1997,《中國的陷阱》,香港:明鏡出版社。
- ,1994,〈中國股份制:社會主義的免費午餐〉,《二十一世紀》,1994年2月號,頁146-153。
- 沈堅,1999,《近代法國工業化新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李昌平,2002,《我向總理說實話》,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
- 李培林(編),2003,《農民工:中國進城農民工的經濟社會分析》,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 李強,2003,〈影響中國城鄉流動人口的推力與拉力因素分析〉,《中國社會科學》,二〇〇三年一期,頁125-136。
- 李漢林、王琪,2001,〈關係強度作為一種社區組織方式——農民工研究的一種視角〉,柯蘭君、李漢林編,《都市裡的村民——中國大城市的流動人口》,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頁15-39。
- 吳介民,2000,〈壓榨人性空間:身分差序與中國式多重剝削〉,

- 《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39期，頁1-44。
- 吳理財，2004，〈農地制度改革—市場化〉，《三農中國》，2004年2期，頁64-68。
- 林毅夫，2004，〈有關當前農村政策的幾點意見〉，《三農中國》，2004年1期，頁1-8。
- 周皓，2001，〈流動兒童的歸屬與權利〉，柯蘭君、李漢林編，《都市裡的村民—中國大城市的流動人口》，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頁174-191。
- 金寶瑜，1989，〈農工部門間的轉移——從評〈原始積累、平等與工業化〉開始〉，《台灣社會研究》，第2卷第1期，頁163-177。
- 保羅·芒圖，1983，《十八世紀產業革命》，北京：商務印書館。
- 柯蘭君、李漢林（編），2001，《都市裡的村民——中國大城市的流動人口》，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
- 柯志明、Mark Selden，1988，〈原始積累、平等與工業化——以社會主義中國與資本主義台灣為案例之分析〉，《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1卷第1期，頁11-51。
- 徐小洪，2004，《衝突與協調——當代中國私營企業的勞資關係研究》，北京：中國勞動社會保障出版社。
- 徐漢明，2004，《中國農民土地持有產權制度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 孫立平，2004，《轉型與斷裂——改革以來中國社會結構的變遷》，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
- ，2003，《斷裂——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中國社會》，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 ，1997，〈中國農民工的流動〉，《中國研究》，1997年春季號，頁3-23。
- 馬克思，1867，《資本論》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



- ，1861，〈經濟學手稿（1861-1863）〉，《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 ，1859，〈政治經濟學批判〉，《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年，頁3-177。
- 崔之元，2003，〈自由社會主義與中國的未來〉，曹天予編《現代化、全球化與中國道路》，北京：社會科學出版社，頁192-226。
- 陳玉璽，1992，《台灣的依附型發展——依附型發展及其社會政治後果：台灣個案研究》，台北：人間出版社。
- 陳俊杰，1998，《關係資源與農民的非農化——浙東越村的實地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陸益龍，2003，《戶籍制度——控制與社會差別》，北京：商務印書館。
- 陸學藝，2002，《“三農論”——當代中國農業、農村、農民研究》，北京：科學文獻出版社。
- 國務院辦公廳，2003，〈做好農民進城務工就業管理和服務工作〉，《人民日報》，2003年1月16日，一版。
- 曹子瑋，2003，〈農民工的再建構社會網與網內資源流向〉，《社會學研究》，2003年第3期，頁99-110。
- ，2001，〈職業獲得與關係結構〉，柯蘭君、李漢林編，《都市裡的村民——中國大城市的流動人口》，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頁71-91。
- 曹錦清，2000，《黃河邊的中國——一個學者對鄉村社會的觀察與思考》，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
- 黃宗智，1994，《長江三角洲小農家庭與鄉村發展》，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 ，1986，《華北的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北京：中華書局。
- 黃德北，2006，〈國企改革與下崗工人：中國大陸勞動力市場建立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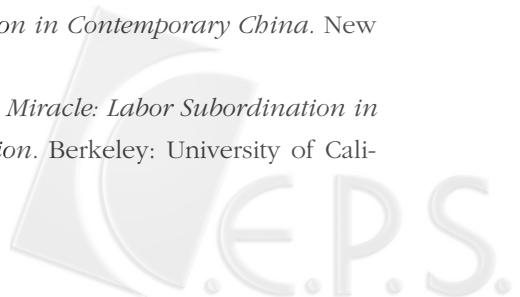
- 政治經濟分析》，《東以研究》，37 卷 1 期（2006 年 1 月），頁 1-40。
- 溫鐵軍，2004，《解構現代化——溫鐵軍演講錄》，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
- ，2001，〈“三農”問題的世紀反思〉，楊帆、盧周來編，《以民爲本關注民生——中國新世紀的前途與選擇》，北京：石油工業出版社，頁 115-127。
- 隅谷三喜男等，1993，《台灣之經濟——典型 NIES 之成就與問題》，台北：人間出版社。
- 費孝通，1994，《鄉土重建與鄉鎮發展》，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 鄔滄萍等（編），1996，《改革開放中出現的最新人口問題》，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 葛志華，2001，《WTO 與中國當代農民》，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
- 翟學偉，2003，〈社會流動與關係信任——也論關係強度與農民工的求職策略〉，《社會學研究》，2003 年第 1 期，頁 1-11。
- 劉進慶，1990，《戰後台灣經濟分析》，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
- 鄭怡雯，2002，〈誰來上崗：中國城市勞動力市場的不平等競爭〉，《台灣社會研究》，第 48 期，頁 45-94。
- 鄭杭生等，1997，《當代中國社會結構和社會關係研究》，北京：首都師範大學出版社。
- 潘維，2003，《農民與市場：中國基層政權與鄉鎮企業》，北京：商務印書館。
- 蔡昉（編），2002，《人口與勞動綠皮書 2002 年：中國人口與勞動問題報告》，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 ，2001，《中國人口流動方式與途徑（1990～1999 年）》，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 戴敦峰等，2004，〈中國遭遇 20 年來首次“民工荒”〉，《南方週末》，2004 年 7 月 15 日。<http://www.nanfangdaily.com.cn/>

zm/20040715/xw/szxwl/200407150005.asp.

- 韓德強，2000，《碰撞——全球化陷阱與中國現實選擇》，北京：經濟管理出版社。
- 韓嘉玲，2003，《〈城市邊緣群體教育問題研究〉》，李培林編《農民工：中國進城農民工的經濟社會分析》，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頁206-226。
- 關信平、姜妙屹，2003，《〈城市外來人口的基本生活與健康服務〉》，李培林編《農民工：中國進城農民工的經濟社會分析》，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頁252-263。

英文部分

- Aston, T. H. and C. H. E. Philpin eds. 1985. *The Brenner Debate: Agrarian Class Structur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Pre-Industrial Europ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ian, Yanjie. 1997. "Bringing Strong Ties In: Indirect Ties, Networks Bridges, and Job Searches in China,"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2: 266-85.
- Chan, Anita. 2001. *China's Workers under Assault*. New York: M.E. Sharpe.
- Cheng, Lucie and Edna Bonacich eds. 1984. *Labor Immigration Under Capitalis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Cheng, Tiejun and Mark Selden. 1994. "The Origins and Social Consequences of China's Hukou System," *China Quarterly*. 139(September): 645-668.
- Davin, Delia. 1999. *Internal Migration in Contemporary China*.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 Deyo, Frederic C. 1989. *Beneath the Miracle: Labor Subordination in the New Asian Industrializa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



- fornia Press.
- Geertz, Clifford. 1963. *Agricultural Involution: The Process of Ecological Change in Indonesi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Hahamovitch, Cindy. 2003. "Creating Perfect Immigrants: Guest-workers of the World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Labor History*. (44:1): 69-94.
- Hinton, William. 1990. *The Great Reversal: The Privatization of China, 1978-1989*.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 Hinton, William. 1966. *Fanshen: A Documentary of Revolution in a Chinese Village*.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 Kirkby, R. J. R. 1985. *Urbanization in China: Town and Country in a Developing Econom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Lee, Ching Kwan. 1998. *Gender and the South China Miracle: Two Worlds of Factory Wome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Luebbert, Gregory. 1991. *Liberalism, Fascism or Social Democracy*.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Moore, Barrington. 1966. *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Lord and Peasant in the Modern World*. Boston: Beacon Press.
- Murphy, Rachel . 2002. *How Migrant Labor is Changing Rural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Oi, Jean. 1999. *Rural China Takes Off: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 of Economic Refor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Oi, Jean. 1992. "Fiscal Reform and Economic Foundations of Local State Corporatism in China," *World Politics*. 45(October):99-126.



- Ong, Paul, Edna Bonacich, and Lucie Cheng eds. 1994. *The New Asian Immigration in Los Angeles and Global Restructuring*.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 Polanyi, Karl. 1944.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New York: Farrar and Rinehart, Inc.
- Salvadori, Massimo. 1990. *Karl Kautsky and the Socialist Revolution: 1880~1938*. London: Verso.
- Selden, Mark. 1993.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hinese Development*. Armonk: M.E.Sharpe.
- Selden, Mark and Chih-ming Ka. 1986. "Original Accumulation, Equity and Late Industrialization: The Case of Socialist China and Capitalist Taiwan," *World Development*. (14:10/11): 1293-1310.
- Solinger, Dorothy. 1999. *Contesting Citizenship in Urban China: Peasant Migrants, the State, and the Logic of the Marke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Sweezy, Paul Marlor. 1964. *The Theory of Capitalist Development; Principles of Marxian Political Economy*.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 Wallerstein, Immanuel. 1983. *Historical Capitalism*. London: Verso.

